

俄国犹太人来华之潮流和 哈津沪俄犹社团的形成与发展

潘 光

摘 要：19 世纪 80 年代起在俄国和东欧掀起的反犹狂潮，导致几万俄国犹太人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东北，再辗转南下，形成了哈尔滨、天津、上海三个俄犹社团。其间，中国东方铁路的修筑、俄国在华势力的兴衰、日俄战争、俄国 1905 年和 1917 年两次革命、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和日本侵占东北等一系列事态发展，又成了推动俄国犹太人先是来到东北，后来又离开东北南下的动因。来华俄国犹太人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经过艰苦拼搏，逐渐成为中产阶级。其二，希望在中国长期居留，努力融入中国文化。其三，社团意识强，社区活动积极。他们逐渐成为来华犹太人中最有影响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俄国犹太人；来华潮流；哈津沪俄犹社团；形成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D829.14；G115；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5)05-0093-09

作者简介：潘 光，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1840 年后，就在黄河岸边的开封犹太人逐渐被同化之时，新的犹太移民又来到了中国。我们之所以将 1840 年作为一个开端，是因为那一年英帝国用枪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清帝国的大门，这才使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外国人再次有可能大批进入中国内地。此后一个世纪里，来华的犹太人形成一股持续不断的潮流，其间又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数十年里从英属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来华经商办实业的塞法迪犹太人，第二次是 19 世纪末叶以后数十年里为逃避反犹恶浪、革命和内战来华谋生的俄国犹太人，第三次是 1933—1941 年间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的犹太难民。经过这三次各国犹太人来华高潮，在中国境内形成了香港、上海、哈尔滨、天津四个犹太社团及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沈阳、大连、青岛等犹太聚居地，还有大批犹太专业技术人员散居在北京等大城市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到 1940 年前后，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约有 4—5 万，其中 50% 是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其余的近 50% 是俄国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虽然财力雄厚，但人数始终徘徊在一千人上下。

本文主要对俄国犹太人来华之潮流和哈津沪俄犹社团的形成作一考察。促使俄国犹太人来到中国的主要不是商业动机，而是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在俄国和东欧掀起的反犹狂潮^①。这股狂潮导致几百万俄国犹太人逃往北美，但也有几万俄国犹太人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东

收稿日期：2004-11-22

^① 1881 年 3 月，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因涉嫌被捕者中有一名犹太人，俄国统治集团乘机在全俄掀起反犹狂潮，后扩至东欧，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初叶。

北和内蒙，再辗转到达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其间中国东方铁路（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以下简称中东铁路）的修筑、俄国在华势力的扩大、日俄战争、俄国 1905 年和 1917 年两次革命、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和日本侵占东北等一系列事态发展，又成了推动俄国犹太人先是来到东北，后来又离开东北南下的动因。就在这股俄犹太来华的潮流中，哈尔滨，天津，上海三个俄犹社团形成了。

早期来华俄犹：哈尔滨、天津犹太社团的形成

虽然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已有少数俄国犹太人因逃避反犹恶浪而来到中国，但俄犹大规模移居中国还是在中东铁路修建以后。1896 年，中俄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银行合同》和《合办东省铁路（即中东铁路——作者）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中国允许俄国修建从西伯利亚经由中国黑龙江、吉林两省，通往海参崴的铁路，该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中国东方铁路公司（以下简称中东铁路公司）建造和经营。1898 年，俄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强占了旅顺港。1900 年，俄国更利用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派兵侵占了东北三省。就在这一系列发展进程中，俄国在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的势力大增，前来中国东三省的俄国官员、军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日益增多。为了鼓励更多的俄国人移居中国东北，沙俄政府竭力宣扬“满洲”是一个美好的“天堂”，并允诺任何愿意移居到这一“天堂”的俄国人（包括犹太人等少数族裔）“都将得到宗教信仰自由、无限制的商业权利和进入没有限额的学校”^①。虽然东北地区当时算不什么“天堂”，但为了摆脱国内对犹太人的限制和迫害，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生活，还是有相当一批俄国犹太人移居中国，有的就在中东铁路和旅顺军港工作，有的则开始经商或办实业。他们大多散居在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沈阳、大连等地，但也有一部分俄犹继续往南迁移以寻找发展机会，在本世纪初来到了天津、上海乃至香港。

由于哈尔滨地理位置优越，在中东铁路项目启动之时便被俄国人选为中东铁路的交汇点和中东铁路公司的管理中心，大批来自俄国的从业人员（其中包括许多俄国犹太人）和中国工人云集哈尔滨，使之很快从一个江边的小渔村发展为一个大都市。1903 年，哈尔滨的俄国犹太人已达 500 人，并建立了哈尔滨犹太人协会（后改名为犹太宗教公会）^②。同年，第一座犹太会堂——西那国窑（即“Synagogue”之音译）会堂在道里炮队街（今通江街）建立，莱文（Levin）拉比成为该会堂，也是哈尔滨犹太社团的第一位专职拉比^③。这标志着哈尔滨犹太社团已经形成。哈尔滨犹太社团是继香港、上海之后在近代中国形成的第三个犹太社团，但与港沪两地犹太社团以塞法迪犹太人为主不同，是中国第一个以阿斯肯那齐（俄国）犹太人为主的犹太社团。除哈尔滨外，当时在东北、内蒙各地散居的犹太人尚未组成稳定的社团。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两强为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了拼杀。次年，日俄战争最终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使俄国国内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爆发了 1905 年革命。统治阶层为了转移矛头，进一步煽动反犹恶浪。反犹分子伪造了《锡安贤达议事录》^④，使俄国的反犹活动达到高潮，数百个城市都发生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成千上万人死

① 马文·托克耶、玛丽·斯沃茨：《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35 页。

②③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 69 卷·外事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7、149 页。

④ 反犹分子蓄意炮制的文件，其中称犹太人制定了一项统治世界的秘密行动计划。

于非命。同时，沙皇政府对犹太人居住地域的限制也越来越苛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还开始强征犹太人入伍。这导致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纷纷逃离俄国，也有更多犹太人来到中国。日俄战争结束后，在中国东北的俄军开始返回国内，日本方面也开始遣返俄军战俘，但许多犹太士兵和战俘不愿返回俄国，一些人就留在东北，也有部分来到了上海和天津等地。这使中国东北三省、内蒙乃至华北和上海、香港的俄国犹太人数增加。

关于 1917 年前哈尔滨犹太居民增长情况的说法不一，最高的统计说，1908 年哈尔滨犹太人已增至 8000 人^①，最低的统计则说，1910 年时哈尔滨有犹太人 1500 左右^②。即使根据最低的估计，从 1903 年到 1910 年哈尔滨犹太人数已翻了一番还多，到 1916 年，一般估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已达 6000 人^③，绝大多数都来自俄国。在此期间，在北满和内蒙北部各地如齐齐哈尔、满洲里和海拉尔的犹太居民数量均有增长，海拉尔和满洲里的犹太人还分别于 1910 年和 1912 年开设了犹太教祈祷所^④。在南满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奉天（沈阳）、大连等地俄国犹太人在日俄战争前有所增加，但在日俄战争后因日本势力控制该地区又有所下降。在华北，北京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犹太人，主要是外交官和教授，各国国籍的均有；青岛也有一批犹太人定居，其中既有德国犹太人，也有一些从东北迁移过来的俄国犹太人。尽管这些城市都有犹太居民，但都不能说已形成了真正的社团，只有天津例外。天津于 1901 年设俄租界，此后俄犹太人数迅速增长。1904 年，犹太人在天津置地建公墓。1905 年，吉利舍维奇拉比在天津建立犹太宗教公会，并租房作为临时会堂，供宗教活动用^⑤。1911 年，又建立了天津希伯来协会（Hebrew Association of Tientsin，也称天津犹太公会）和慈善协会，募集资金救助贫困犹太人^⑥。此时天津犹太人估计已有数百人，但无准确统计资料。犹太宗教公会、犹太会堂和犹太人自办社会救济组织的出现，表明天津犹太社团已经形成，这是中国第四个犹太社团，也是继哈尔滨之后又一个以阿斯肯那齐（俄国）犹太人为主的犹太社团。同时，香港上海两地也有越来越多俄国犹太人定居，使塞法迪犹太人在港沪犹太社团内部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开始改变。

俄犹太来华高潮：哈尔滨、天津犹太社团及其它俄犹太聚居地的兴衰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随着国内战争的激化，大批俄国和波兰难民纷纷穿越西伯利亚涌入中国东北地区，定居在哈尔滨、沈阳、大连以及中东铁路沿线小城，其中就有大量的俄国犹太人。于是，哈尔滨犹太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1920 年定居哈尔滨的犹太人已达 12000—13000 人，而经哈尔滨等地辗转去北美西欧的犹太人也达万人^⑦。其中又有一部分俄犹太继续南迁，来到天津、上海。同时，也有不少白俄和俄犹太经海路直达津沪。1931 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又建立“满洲国”，使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受到冲击，政治安全也无保障，结果有更多的俄国犹太人离开哈尔滨南下津沪。

哈尔滨犹太社团在 1917—1931 年间进一步发展。1919 年，哈尔滨犹太社团经过民主选

① I·埃班（Irene Eber）：《中国和犹太人》（*China and the Jews*），马萨诸塞，哈佛大学 1992 年版，第 37 页。

② H·迪克（Herman Dicker）：《远东的流浪汉和定居者，一个世纪来中国和日本的犹太社团》（*Wanderers and Settlers in the Far East, 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China and Japan*），纽约 1962 年版，第 22 页。

③ J·高斯坦（Jonathan Goldstein）编：《中国的犹太人》卷 1，《历史和比较研究》（*The Jews of China, Vol. On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纽约州阿蒙克 1999 年版，第 203 页。

④ 房建昌：《近代内蒙古的犹太人》，《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1 期。

⑤⑥ 房建昌：《近代天津的犹太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 年第 2 期。

⑦ 《远东报》1926 年 12 月 7 日。

举产生了社团领导机构——社团委员会 (Community Council)，负责指导和处理与犹太人相关的事务。这标志着哈尔滨犹太社团进入了鼎盛时期。到上世纪 20 年代，犹太社团建立了自己的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养老院、慈善社、免费食堂、墓地等文化教育和卫生福利机构，出版了一批报纸杂志。犹太人的经济活动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创办了工厂、贸易公司、宾馆、商店、银行，甚至还积极参与哈尔滨股票交易所的各项投资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 1924 年起，该股票交易所的董事长一职在较长时间里由犹太实业家卡巴尔金 (Kabalkin) 担任。在建立第一所犹太会堂后，犹太人在哈尔滨又建立了第二座犹太会堂，位于埠头区斜纹街，比前者更为宏伟。来自俄罗斯的基塞列夫拉比 (Rabbi Aron Moshe Kiseleff) 于 1913 年来到哈尔滨任职，后成为哈尔滨犹太社团的首席拉比。1912 年由俄国移居哈尔滨的考夫曼博士 (Abraham Kaufman) 是哈尔滨犹太社团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1919 年首次被选为社团委员会主席，以后长期担任这一职务，直到 1945 年。

然而，从上世纪 20 年代末起，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犹太社团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遭到了一系列外部冲击，开始逐渐由盛转衰。首先，苏联政府于 1928 年将中东铁路公司管理权交还中国。中东铁路管理权的这一转移增强了中国人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参与度，使犹太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其次，1929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哈尔滨的犹太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一些从事国际贸易和毛皮业的犹太商号损失更大。再次，1931 年日本的入侵和 1932 年满洲国的建立，使犹太社团的经济遭到了沉重的冲击。此前，不管是军阀政权还是国民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一直非常松散，这正是犹太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但是，日本占领东北后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建立起一个集权体制来控制经济。这样，很少与中国当局打交道的犹太社团不得不面对一个专横的剥夺者。一方面，当日本人夺取了中东铁路后，成千上万的俄国人离开了铁路区和哈尔滨，这就使一些一直以铁路公司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犹太零售商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战争的频仍和日本当局的暴行也破坏了以往充满活力的哈尔滨经济环境，使许多犹太贸易公司和商店的经营举步维艰，大批犹太商人不得不迁离哈尔滨。

更有甚者，在日本占领东北后，哈尔滨等地频频发生由白俄挑起，得到哈尔滨的日、德法西斯党徒支持的反犹活动。由德国资助，并得到部分日本人支持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俄国组织”在哈尔滨成立，为首的是康斯坦丁·罗德左夫斯基^①。他们出版了反犹报纸《我们的道路》，进行恶毒的反犹宣传，还频频冲击犹太人的商店、学校，打碎犹太会堂的玻璃，绑架勒索犹太富商。特别要提一下的是，1933 年，现代大饭店经理约瑟夫·卡斯帕之子西蒙·卡斯帕 (Simon Kaspe) 遭绑架并被杀害，这一事件使哈尔滨的反犹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约瑟夫·卡斯帕于 1907 年从俄国来到哈尔滨，到上世纪 30 年代初已经成为哈尔滨有名的犹太富商，并加入了法国籍。哈尔滨市中心赫赫有名的“现代大饭店”就是他名下的资产。其子西蒙是位卓越的钢琴家，就学于巴黎音乐学院。1933 年 8 月，西蒙暑假归来携女友外出，途中竟遭人绑架并残杀。事后，哈尔滨和上海的犹太社团都就此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抗议。哈尔滨犹太社团为西蒙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侨民参加了这一葬礼，并高呼反对日本当局、要求惩办凶手的口号^②。1934 年，在日本的操纵下，哈尔滨成立了白系露人事务局，属伪满洲国政府民政部领导，对哈尔滨、满洲

① 笔者采访马吉德 (Isador Magid) 记录，1997 年 10 月 20 日于墨尔本。

② 万斯白：《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间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6 页。

及其他地方的俄国犹太人实行监控^①。这种日趋恶化的生存环境致使哈尔滨俄犹大量南迁上海、天津、青岛等地。虽然日本一些“犹太问题专家”提出了以实行亲善犹太人政策来巩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并缓和与英美苏关系的主张，但到 30 年代中期，差不多有 70% 的哈尔滨犹太人离开了这个城市^②。30 年代哈尔滨犹太人南迁的路径主要有三条：(1) 由哈尔滨到海参崴，经海路抵津沪；(2) 由哈尔滨经长春、沈阳至大连，再由海路抵津沪；(3) 由哈尔滨到天津，沿津浦线经南京抵沪。

天津犹太社团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迅速扩大，到上世纪 20 年代已达千人，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因哈尔滨犹太人南迁而进一步扩大。不过，关于天津犹太人数量的统计和说法差异极大。最高的统计称，1935 年天津有犹太人 3500 人左右^③。较低的统计说，1935 年天津犹太人大约为 1500—1700 人^④。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天津犹太人从未超过 2500 人^⑤。天津的犹太人虽不如上海、香港犹太人富裕，但在经营皮毛生意上十分成功。他们在东北和西北购得毛皮后在天津加工制作，然后远销欧美市场，盈利颇为丰厚。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皮毛出口遭受打击，一些天津犹太商人不得不转到其他生意上。著名皮毛商格尔斯维奇 (Lev Gershevich) 长期担任慈善协会等组织的负责人，成为天津犹太社团的主要领袖。除前已提到的公墓和临时会堂外，天津犹太社区还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医院、俱乐部、学校、养老院、图书馆等公共集体机构。1939 年，天津犹太人建立了一座宏伟的犹太会堂，以取代旧的临时会堂和祈祷所，由莱文拉比主持。著名的天津犹太学校 (Tientsin Jewish School) 建于 1925 年，不但为天津，也为华北和其他地方的犹太青少年提供就学机会。该校以英语授课，不但讲授犹太宗教文化历史，还开设了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教学质量较高，其毕业生大多能进入欧美大学继续深造。犹太俱乐部创办于 1928 年，是天津犹太社团的文化活动中心，拥有图书馆、剧场、餐厅、棋室、台球室等各种文化、娱乐、体育设施。

黑龙江省海拉尔和满洲里的犹太人主要都是做皮毛、木材、肠衣、运输生意的商人。1917 年俄国革命后两地犹太人数量上升，但 1931 年后又有所下降。据日本方面 1940 年的调查统计，海拉尔和满洲里当时有犹太人 130 人^⑥。另据日本方面 1924 年的资料称，当时两地都已建有犹太会堂^⑦，估计是由早期的祈祷所发展而来的。海拉尔犹太人还建立了犹太宗教协会，下设宗教部、文化教育部和慈善部^⑧，满洲里也有类似组织，称犹太侨民会 (1926 年成立)^⑨。据伪满洲国的文件提到，上世纪 30 年代在满洲里和海拉尔均有犹太学校，满洲里犹太学校 1934 年有学生 80 名，教职工 5 名^⑩。但也有学者认为，文中提到的两所学校可能是指同一学校^⑪。

齐齐哈尔早在本世纪初已有俄国犹太人居住，到 1917 年后人数增长，1918 年开设了犹太教祈祷所^⑫。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后齐市犹太人口也呈下降趋势。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

① 房建昌：《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犹太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 年第 4 期，第 80 页。

② 马文·插克耶、玛丽·斯沃茨：《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37 页。

③ 房建昌：《近代天津的犹太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 年第 2 辑。

④ 贝克曼 (M. W. Beckelman)：《天津犹太社团》(The Jewish Community of Tientsin)，《犹太中心》(The Jewish Center) 1946 年 6 月号，第 10 页。

⑤ I·埃班 (Irene Eber)：《中国和犹太人》(China, and the Jews)，马萨诸塞，哈佛大学，1992 年，第 40 页。

⑥ 满铁调查部：《在满犹太人：经济的过去及现在》，大连，1940 年，第 20 页。

⑦⑧⑨⑩⑪ 房建昌：《近代内蒙古的犹太人》，《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 1997 年第 1 期。

⑫ 房建昌：《近代中国犹太教会堂及祈祷所考》，《世界宗教研究》1997 年第 1 期。

1940 年齐齐哈尔有犹太人 50 人^①。

早期在大连的犹太人主要是俄国军队中的犹太裔军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犹太民族英雄的特鲁姆佩尔道 (Joseph Trumpeldor)^②。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俄军撤走，但一些犹太裔军人及其家属留了下来。此后不断有俄国犹太人前来大连，到 1917 年后数量更增。大多数人定居后经商办实业，主要从事皮毛、西药、食品、餐饮、宾馆、运输、化工等业，不少公司商号是欧美及上海、香港、哈尔滨犹太公司企业的分支或代理商。1931 年日占东北对大连犹太人影响不大，因为大连早已处在日本势力控制之下，倒是有些哈尔滨犹太人在卡斯帕事件后离开哈市来大连，使大连犹太人数有所上升。根据 1940 年日本当局的统计，大连犹太人有 259 人^③。大连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犹太人会馆（也就是犹太俱乐部，会馆是日本式说法），下设祈祷室、图书馆、事务室、会议厅等^④。值得一提的是，大连犹太人一直没有建正式的犹太会堂，宗教仪式一直在会馆下设之祈祷室举行，这是我们没有把它称为“社团”的重要原因。大连犹太人的社区组织成立很晚，是到 1937 年后才仿照哈尔滨的模式建立的，被日本当局称为“大连犹太人会”，会长考涅尔，秘书长利别尔曼^⑤。虽然有少数塞法迪犹太人和来自中欧的犹太难民前来大连定居，但绝大多数大连犹太人是俄系犹太人。

前已提及沈阳（奉天）的俄国犹太人在日俄战争后一度减少。到 1917 年俄国革命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沈阳犹太人的数字又有所上升。与大连的情况相似，1931 年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没有使沈阳犹太人数大减，因为虽有些犹太人因此离开了沈阳，但同时又有一些犹太人从北满南下来到了沈阳。据日本方面 1940 年的统计，沈阳约有犹太人 100 名^⑥。沈阳犹太协会也是在 1937 年后才积极开展活动的，主要活动有救济犹太贫民、帮助犹太难民就业，为巴勒斯坦民族基金募捐，捐款帮助天津水灾难民，为日本伤病员捐款，建立藏书达 3850 册的图书馆等^⑦。该会会长为雅诺维奇^⑧。沈阳犹太人也没有建犹太会堂，这也是我们没有将其列为“社团”的主要原因。

虽然最早定居山东青岛的犹太人来自德国，但这个犹太人聚居地是随着 1917 年俄国革命后大批俄国犹太人的来到而发展起来的。根据 1939 年底的统计，青岛有犹太居民 220 人，其中无国籍者（主要为俄国犹太人）达 173 人^⑨。青岛犹太人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建立起了青岛犹太人会，下设犹太会馆、俱乐部、临时会堂、拉比住宅等，会长蔡伯尔曼，副会长托瓦宾斯基^⑩。青岛犹太人主要经营舞厅、饭店、酒吧、理发店、医院诊所、西服店、乐器店等，面向各国船上人员和前来避暑的阔佬，一度生意十分兴隆。

前已提及，北京的犹太人主要是外交官和学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卡拉汗 (Lev Karakhan)，燕京大学教授、德籍犹太人罗文达 (Rudolf Loewenthal)，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德国犹太人魏登瑞 (Franz Weidenrich) 等。日本方面 1940 年对北京的犹太人作过调查，结果是北京共有犹太人 120 名^⑪。由于一些外交官和学者不愿披露自己的犹太出身，且他们的工作地点变化频繁，这一数字必定是极不完整的。与前述各地不同，北京的犹太人

① 满铁调查部：《在满犹太人：经济的过去及现在》，大连，1940 年，第 20 页。

② 特鲁姆佩尔道生于俄国，应征入伍后升为军官，驻在大连，在日俄战争中失去左臂，荣立军功。后移居巴勒斯坦，成为早期锡安主义军事组织负责人，在与阿拉伯人的战斗中阵亡。锡安主义修正派的青年组织“贝塔”即以其名字命名。

③ ④ ⑤ ⑥ ⑦ 房建昌、李薇：《近代辽宁犹太人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

⑧ ⑩ 房建昌：《近代中国犹太教会堂及祈祷所考》，《世界宗教研究》1997 年第 1 期。

⑨ ⑪ 房建昌：《内蒙古、辽宁、北京、天津及青岛犹太人史 1911—49》，送交“犹太人在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打印稿，1997 年 9 月，德国圣·奥古斯丁，第 16、10 页。

各有自己的职业, 并没有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 也没有会堂, 因此不但算不上社团, 连聚居地也算不上。

综上所述, 在中国北方, 随着俄国犹太人来华潮流而兴起并发展的主要是哈尔滨和天津两个犹太社团及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沈阳(奉天)、大连、青岛等犹太聚居地, 同时也有许多犹太人来华后散居于北京等其他城市。

俄犹南下上海: 上海俄犹社团的形成和发展

从 19 世纪末起, 主要来自俄国的阿斯肯那齐犹太人开始定居上海。一些材料提到, 1887 年来沪的哈莫维奇(Haimovich)可能是最早在上海定居的俄国犹太人^①。接着, 又有一些俄国犹太人办的商行, 如经营茶叶的维舍特斯基公司(W. Wissotsky & Co.)等, 纷纷在上海设立分行或代办处。不过, 在 1902 年以前, 上海的俄国犹太人人很少, 尚不需要建立独立犹太会堂, 宗教活动常与塞法迪犹太人一起进行。随着人数的增加, 俄国犹太人在 1902 建立自己的会堂委员会, 由坎默琳(H. Kmmmerling)任主席, 租房建造了摩西会堂(Ohel Moishe Synagogue)。

1925 年, 在刚从海参崴来沪不久的俄国犹太人鲍里斯·拉宾诺维奇(Boris Rabinovich)的邀请下, 迈耶·阿许根那奇拉比(Rabbi Meir Ashkennazi)来到上海。阿许根那奇拉比 1883 年生于耶路撒冷, 是一位宗教学者, 属哈西德派^②中最为正统的俄国支系卢巴维奇派。到上海后, 阿许根那奇担任摩西会堂的拉比, 成为俄国犹太人的精神领袖, 在上海犹太人中的威望逐渐上升。后来不仅俄罗斯、波兰犹太人尊敬他, 而且塞法迪犹太人遇到宗教法律问题时也向他请教。1926 年后, 他成为上海首席大拉比, 直至 1949 年。

在阿许根那奇拉比的努力下, 摩西会堂于 1927 年迁至虹口华德路(今长阳路)。新建会堂还依照犹太律法, 设立了供妇女单独礼拜的专席。进入上世纪 30 年代以后, 俄罗斯犹太人越来越多, 超过了 4000 人, 原来的会堂显然已无法容纳。于是, 俄罗斯犹太人积极筹划兴建新会堂。1937 年 11 月, 上海俄罗斯犹太社团在法租界购买了一块土地, 成立了会堂建设委员会, 负责新会堂的建设, 许多俄罗斯犹太人纷纷捐款相助^③。1941 年逾越节到来前, 会堂顺利落成, 取名“新会堂”(New Synagogue)。新会堂能容纳 1000 人进行宗教活动, 因座落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102 号, 故又被称为“拉都路会堂”。

由于上海俄罗斯犹太人大多是无国籍移民, 因此刚来沪时都加入俄罗斯无国籍居民于 1926 年成立的上海白俄居民委员会(White Russian Emigrants Committee of Shanghai), 其在委员会内的代表是上海摩西会堂俄犹协会(Russian Jewish Community in Shanghai “Ohel Moishe Synagogue”)。不过, 上海白俄居民委员会内部具有较强的反犹倾向, 使俄犹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 到 1932 年, 上海俄犹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上海阿斯肯那齐犹太宗教公会(Shanghai Ashkenazi Jewish Communal Association, SAJCA), 简称上海犹太宗教公会。上海犹太宗教公会的成立在上海白俄组织内部引起了争议。白俄领袖格列博夫将军无端指责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受苏联控制, 并否认了该会的代表资格。上海犹太宗教公会为此发表声明, 表

① 维克多(P. Victor):《黄浦江边的上海》, (Shanghai on Whangpoo), 载美国俄侨历史协会(Russian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编的《论文集》(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Stories), 华盛顿, 1985 年。

② 哈希德派是犹太教内的一个虔修学派, 18 世纪兴起于波兰。该派提倡感性和灵交, 强调礼拜内容多样化。

③ 满铁调查部:《第三回极东犹太民团代表大会概观》(犹太问题调查资料第 22 辑), 1940 年, 第 44 页。

示该会与白俄组织的活动无任何关系，也不承担任何责任^①。1937 年，上海犹太宗教公会正式在上海工部局注册。

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内设主席团和干事会，处理宗教、教育、救济、丧葬、医疗、对外联络等方面事务，同时还兼有监督、指导犹太会堂、犹太贷款所、犹太养老院、犹太圣葬社、犹太救济会等机构日常工作的职能。由于上海犹太宗教公会组织严密、服务热情周到，深得俄罗斯犹太人的信任和拥护，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它已成为上海犹太人的主要机构，以致外界与上海犹太侨打交道也大多通过宗教公会，不再与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往往只能代表塞法迪犹太社团的利益）联系。

由于俄罗斯犹太人大都具有较强的锡安主义倾向，在哈尔滨就建立了一系列锡安主义组织。来到上海后，俄罗斯犹太人一方面参加塞法迪犹太人创建的上海锡安主义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创立自己的锡安主义组织。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的建立是俄罗斯犹太社团乃至整个上海犹太社区深感骄傲的一件事。上海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始建于 1853 年 4 月，又名上海义勇队。当时，太平天国起义震撼全国，上海的小刀会起义也使上海外侨感到十分害怕。于是，各国驻沪领事召开紧急会议，以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为名，集合在沪各国外侨组成了这个武装自卫团体。成立之初，商团仅 200 人左右。到了 1870 年，工部局成立“团练处”将它接管，遂使其得到迅速发展。自上世纪 20 年代末起，上海万国商团一般保持 2000 人。1932 年夏，部分来自哈尔滨的俄犹青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某处开会，决定正式要求在万国商团内建立犹太分队。随之，他们将要求呈交给商团团团长，并获得批准，但规定犹太分队必须先作为万国商团现有分队中的一个小分队。于是，犹太小队被确定归属于由托德（C. C. Todd）上尉指挥的“H”分队。犹太小队于 1932 年 9 月 22 日正式成立。多年从事犹太童子军训练工作的雅各布斯（N. S. Jacobs）被任命为少尉，负责指挥犹太小队。小队的另两位军官是比特克（R. B. Bitker）中士和泰兰（M. Talan）中士。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原分别在俄国分队和野战炮分队中服役。2 个月后，第二支犹太小队宣告成立。比特克中士被升为少尉，并负责指挥这一新成立的小队，雅各布少尉则晋升为中尉。由于两支犹太小队队员热情高涨，成立犹太分队的时机已经成熟。1933 年 5 月 22 日，“H”分队中非犹太队员转入其他分队，“H”分队便成为由清一色的犹太队员组成的犹太分队，雅各布斯中尉同时晋升一级。犹太分队成立后，在军事训练等方面取得了稳定的进展^②。不久，泰兰中尉离沪去香港，比特克中尉也于 1936 年 10 月去了巴勒斯坦。但好在此时野战炮分队正好解散，戈德金（S. Godkin）中士和戈登堡（W. Goldenberg）中士被调到犹太分队担任军官。1938 年，随着比特克中尉重返分队，犹太分队共有 4 名军官，即队长雅各布斯上尉，副队长戈德金中尉，小队长戈登堡中尉和比特克中尉。起初，犹太分队的士兵都是俄罗斯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则参加英国分队，只是到了 40 年代，才有少量塞法迪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加入。

上海犹太总会（Shanghai Jewish Club）也是俄罗斯犹太社团创办的有影响的机构。它于 1932 年 1 月开始筹建，地址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许多知名俄罗斯犹太人出席了隆重的奠基仪式，其中有阿许根那齐拉比，著名国际象棋高手法因兰德等人。同年 8 月总会正式成立，当时仅有会员 75 人，1933 年增至 200 人。1947 年 4 月犹太总会迁往法租界毕勋路

① 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 1993 年版，第 472—473 页。

②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197 页。

(今汾阳路)新址。设在由犹太富翁提供的一幢花园洋房内。犹太总会创始人、犹太总会终身理事长为俄罗斯犹太社团领袖之一,从事木制品生产与经销的贝乐有限公司老板布洛赫。列维京和比特克尔任该会副理事长。犹太总会成立后,经常举行各种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成为俄罗斯犹太社团的活动中心。

1933 年 11 月,犹太总会文艺小组成立,此后每星期四举办一次晚会,故又称“星期四聚会”,简称“星四会”。犹太总会文艺小组下设文学室、美术室、音乐室、声乐室、舞蹈室、话剧室、国际象棋室 7 个研究室^①,分别探讨不同的艺术领域。小组的宗旨是使所有热爱艺术者联合起来,并对他们从事的某一艺术领域提供帮助,参加活动的人数通常在 60 名以上。

犹太总会还建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都是由犹太组织和个人捐赠的。其中阿许根那齐拉比捐赠的希伯来和意第绪语书籍尤为珍贵。上海犹太总会的会员绝大多数为俄罗斯犹太人。上海塞法迪犹太人出于种种考虑,一般不参加上海犹太总会的活动,而进出于入会条件限制极严的上海英国总会。

此外,上海俄罗斯犹太人还建立了犹太圣裔社、犹太养老院、犹太贷款所、犹太圣葬社、犹太助学会等组织。犹太养老院的前身为成立于 1916 年的上海希伯来救济会(Shanghai Hebrew Relief Society)和收容所(Shelter House),后改为养老院。上海希伯来救济会开始时主要由犹太妇女组织并筹集资金。阿许根那齐拉比的夫人在建立收容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犹太养老院由俄罗斯犹太人卡墨林和泰勒达诺夫分任院长和簿记。该院常住 50 名孤老,并每天向附近贫民发放 120 客午餐。犹太贷款所创建于 1937 年,主要是为俄犹商人提供临时性贷款。犹太圣葬社于 1922 年成立,它与塞法迪犹太人圣葬社一起在上海建造了两座公墓:倍开尔路(今惠民路)公墓和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公墓,并共同为上海犹太人办理丧葬事宜。犹太助学会成立于 1922 年,主要为无力上学的俄罗斯犹太学生提供资助。到上世纪 30 年代中叶,上海俄犹太人数已达 5000 人,远远超过了塞法迪英籍犹太人。

结 论

综上所述,来华俄国犹太人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经过艰苦拼搏,逐渐成为中产阶级。大多数俄国犹太人初到中国时一贫如洗,只能借钱做些小本经营,但通过艰苦创业,逐渐成为哈津沪等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其中少数人更成为巨富,其职业构成多为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也有不少文化人。

其二,希望在中国长期居留,努力融入中国文化。俄国犹太人与重视英国身份的塞法迪犹太人不同,他们并不把俄国视为自己的祖国,也不想返回俄国,这可能是因为俄国遭受的迫害过于惨痛而致。他们中大多数人愿在中国长期居留下去,有些人还申领了中国护照。他们努力适应中国文化,不少人学会了说中国话,还有一些人与中国人通婚。如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就是加入了中国国籍的俄国犹太人,他的夫人也是中国人。

其三,社团意识强,社区活动积极。如在上海,俄国犹太人虽然不如塞法迪犹太人那样富有,但社团意识强,社区各类组织十分活跃,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互助合作能力也强,因而逐渐成为上海犹太人中最有影响的中坚力量。

(责任编辑:王思重)

^① 汪之成:《旅沪俄犹太与上海犹太总会》,《社会科学》1996 年第 8 期。